

摘要 在中国民居研究的发展历程中,1960年代编写的《浙江民居》作为重要的民居研究著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但该著作的研究方法的形成背景及其历史价值仍有待挖掘。采用历史文本研究法,以该书的编写目的、编写与调研人员的教育背景为切入点,探究《浙江民居》的研究路径。研究表明,该书以“布扎”体系的“构图”“要素”与“构图法则”的视角对民居的建筑、村镇等多尺度要素进行了拆分和分类整理,并与功能、空间、体形环境等现代主义设计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民居研究的新方法,体现了研究团队建筑师们的设计思想。

关键词 《浙江民居》 布扎 现代主义 构图 要素 构图法则 功能与空间 体形环境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Zhejiang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s a recognized book compiled in the 1960s, has had a lasting influence. But its 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value still need to be explored.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and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writers and researcher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Zhejiang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through historical textual analysis. It shows that the book divides and classifies the multi-scale elements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villages and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osition” “elements” and “primary rules” of “Beaux-Arts”, and combines the function, space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modernism, which reflects a new method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ideas of architects in the research team at that time.

KEY WORDS *Zhejiang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Beaux-Arts; modernism; composition; elements; primary rules; function and space; physical environment

DOI 10.12069/j.na.202205034

中图分类号 TU24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22)05-0034-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51108241)

沈攀 林广思*

SHEN Pan LIN Guangsi

“布扎”与现代主义的融合

——从《浙江民居》看一种中国民居研究方法

Fusion of “Beaux-Arts” and Modernism: A Research Metho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Residence through *Zhejiang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20世纪40年代至今,我国传统民居研究经历了从开拓到兴旺的过程。40—50年代的研究大多将民居视为古建筑或者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注重民居的历史沿革、类型的考据,并通过平面、立面、剖面、手绘外立面、照片及详图等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民居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1-3]。另有部分研究关注民居的艺术形象、平面布局、构造样式及做法等,通过建筑的组成要素解析民居建筑^[4-5]。50—60年代,民居研究通过实物测绘、访谈调查、摄影、查阅资料等方法,关注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类型、空间、结构、材料、外形、装饰等方面内容^[6]。60年代初期的研究,相较于40、50年代的研究更加关注空间及其使用,虽然历

时不久,但对后续民居及建筑学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在60年代的民居研究中,以中国建筑研究室^①(以下简称研究室)编写的《浙江民居》最具典型性。1961年,研究室民居组对浙江吴兴、东阳、杭州、天台、绍兴等20余县、市的民居进行了调查,1963年完成《浙江民居》初稿^②。但因研究室于1965年被撤销,导致原稿未能及时出版,直到1984年9月,该书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2007年和2018年两次再版(图1)。

该著作对浙江民居的一些优秀、典型实例及若干处理手法,如布局、平面与空间的处理、体形面貌、地形利用、构造及装饰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归纳^{[8]1-2},并得到了广泛的

[作者单位] 沈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510641)

林广思: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广州,510641)

*通讯作者(E-mail: asilin@126.com)

认可。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以“建筑研究院深入调查浙江民居建筑”为题对此次民居调研的概况和初步的成果进行了报道(图2a)^[9]。同年4月,上海和杭州分别举办了浙江民居专题的阶段成果展览。当时,很多著名建筑师都参观了此次展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民居建筑“平面有条理,又有传统又符合摩登概念”^[10]。同年5月,《人民日报》以“浙江民居建筑艺术”为题对此次调研的成果进行了报道(图2b)^[11]。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王其明代表“浙江民居”课题组在会议上宣读了成果概要论文,获得好评^{[12][153]}。汪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建筑系也曾见到该系将《浙江民居》作为教材^{[12][153]}。1979年,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的山墙和围墙的结合处理方式、单坡屋顶、硬山隔墙与浙江民居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极大的相似性^[13]。2022年,张永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建造”展览开幕式的主题报告中,给学生们强烈推荐《浙江民居》^[14]。由此可见,《浙江民居》仍有其价值和研究必要性。

当前,少有与此著作相关的研究,且多聚焦于对《浙江民居》文本本身的解读。例如:1962年,研究室总负责人汪之力对浙江民居调研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概要总结^[15];2014年,赵越在研究中指出,《浙江民居》将现代主义“空间”概念引入,首次将建筑与环境、建筑室内外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16]44};2017年,邵星宇通过对《浙江民居》和相关报告文件的分析认为,多种观念的并存与混杂是《浙江民居》的重要特点,既有对建筑中人的生活空间的关注,也有对外部形式要素的总结^{[17]82-83}。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对《浙江民居》的研究还应加强编写与调研人员和文本(text)之间内在关联的探寻,并将该文本放在其所处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中,才能对《浙江民居》进行更为全面的阐释^[18]。

当时,民居组负责对“浙江民居”专题展开调查的两位组长分别是尚廓和王其明(梁思成的研究生)^{[19]85}。笔者通过对尚廓专业发展脉络的研究发现,他既接受了“布扎”体系的建筑教育,同时也受到了“功能”“空间”“建筑整体环境”等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20]。然而,研究团队其他成员的设计思想还未明析,而且他们的思想在《浙江民居》中是否得到了表达也有待探究。所以,本研究从编写与调研人员的教育背景分析他们的建筑设计思想,并连同尚廓的设计思想对《浙江民居》的内容



2a 各版本《浙江民居》封面
a 《浙江民居》手稿 b 1984年《浙江民居》
c 2007年《浙江民居》 d 2018年《浙江民居》

2b 浙江民居调查研究登上报纸
a 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
b 196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进行解读。旨在通过将《浙江民居》与其编写与调研人员相关联,探究当时“浙江民居”专题研究的背景、方法和表达途径,同时揭示该书编写与调研人员作为建筑师的建筑设计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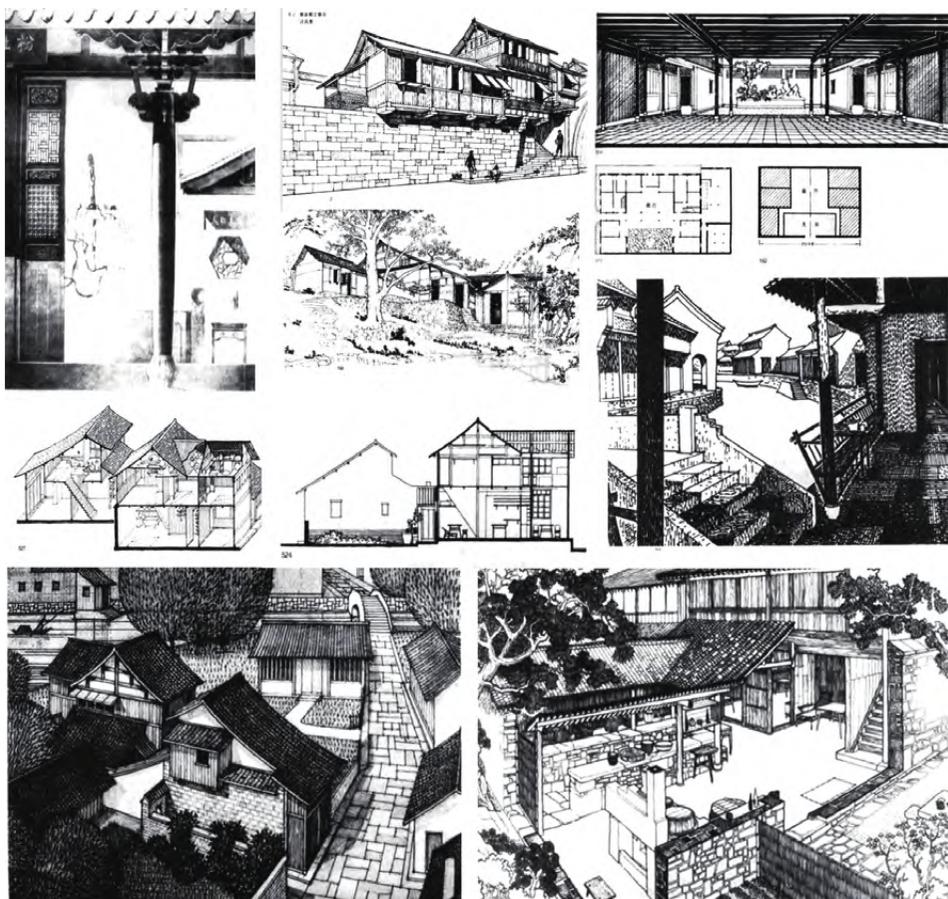
1 《浙江民居》的研究背景

1.1 “科研为设计服务”的调研立项

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向苏联学习,建筑行业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继而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视。当时,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风格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实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和政策^[21]。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建筑行业向纪念性、形式主义的方向发展,推动了复兴民族建筑形式的高潮。然而,由于当时大多数设计师对中国古代建

筑的认识不足,他们将中国民族形式的建筑创作当做是模仿古代的大屋顶、斗拱、庙宇、宫殿等,不加区分地把大屋顶搬到许多建筑物上^[22]。上层建筑的引导和建筑师们不加区分的借鉴促使以“大屋顶”为代表的“复古主义”的兴起,但是这种营造方式由于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随后便受到了批判,继而不再为人们所提及^[23]。

中国建筑师们并没有停止对民族形式的探索,继而开始将借鉴的视角由“大屋顶”转向“传统民居”,将民居建筑作为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建筑的样式进行参考。然而,当时国内有关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工作尚未起步,可供参考的资料、成果过少^{[24]86-92}。因此,1953年研究室成立,旨在为设计单位的设计工作提供传统民居方面的参考资料^{[24]87},当时的研究重点为安徽、浙江、福建地区的民居。1958年6月,研究室的各分室逐渐开展了对各地民



3 《浙江民居》中多种观念的建筑图示表达

居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其中，以“北京总室”民居组对浙江民居的调研最为充分^[25]。此次调研为了响应“科研为设计服务”的号召，从“设计”的角度出发，用建筑师的语言描绘和记录民居中有价值的手法，以便为建筑师们提供设计参考^[26]。

1.2 编写与调研人员多元设计思想背后的教育背景

据傅熹年回忆：“为了更好地研究浙江民居，研究室民居组一共10人都去了浙江，研究经历了1961年整年。”^{[19]65}民居组组员中王其明、傅熹年、于振生、孙大章等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其他组员如尚廓、陈耀东、何国静等分别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工程系（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在1952年国内建筑院校调整后，全国统一以“建筑系”命名，同时建筑教育体系引入苏联典型的“布扎”体系（又称学院派教育体系）。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教学计划下发至各学校后，各校大多遵照执行，虽然各校内容上有一定调整，但总体上几乎没有很大的改变^{[27]146}。因此，1952年入学的组

员如于振生、尚廓、陈耀东、何国静均接受的是系统的“布扎”体系教育。

1952年前，当时名为“营建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正经历着教学内容的改革^③。王其明对“营建系”的教育体系改革进行了总结：“①‘空间理论’的宣扬；②‘抽象图案’的训练；③对‘城市规划’的重视；④注意到建筑的‘社会科学属性’；⑤对工程技术课的高要求等。”^{[28]19-21}钱锋认为，此次教育改革主要体现了“空间”和“体形环境”^④等思想的影响^{[27]120-125}。

首先，在赖特告知梁思成《道德经》中“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最好的空间理论后，梁思成经常用这段经历向学生们传递“建筑是空间组织的艺术”的空间理念，“梁先生给学生辅导建筑设计时，总是强调空间效果，要求在研究平时，就要有空间概念”^{[28]19}。该思想影响了学生们后来的研究。例如傅熹年在1957年发表的《记北京的一个花园》中认为，该园的空间组合主要由游廊、假山、树石等

进行组织，并且园内由开敞到封闭、由封闭再开敞的空间处理手法，使得园子曲折有致^[29]，这体现出“空间组合”“空间构图”的思想。

其次，“体形环境”的思想被用于清华大学建筑学的教学体系建设^{[27]121-122}。在创立“营建系”之后，梁思成陆续试设了市镇组、造园组^[30]。傅熹年称，此时梁先生在建筑学术思想上已经突破了狭义建筑概念的局限。宏观上，他的视角从单纯房屋扩大到城市、园林；微观上，深入到室内布局陈设。这个思想可以视为现在创造人类居住环境思想之滥觞^[31]。这些改革措施是深具西方“布扎”体系教育背景的中国学者，受到现代建筑思想影响后，对教育方法所做出的独特思考和尝试，即现代主义思想和“布扎”思想的某种折衷^{[27]130}。

此外，即便编写与调研人员都接受了统一的“布扎”教育，但还会因学校不同，而导致建筑设计思想的差异。例如尚廓虽然接受了系统的“布扎”教育，但受到系主任徐中的影响，也学习了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所以，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编写与调研人员构成了团队思想的多样和杂糅，思想上的多样性能在民居调研中发挥作用，得益于“采风”这种民居研究方式。调研团队将浙江民居中对建筑设计有参考价值的东西进行记录。一方面，把空间当做一种新的设计角度进行调查，选择有特色空间的民居；另一方面，关注造型好的民居，包括均衡、尺度、质感、色彩等^{[12]153}。每个建筑资料都需要按照平面、立面、剖面、透视图的形式记录，空间手法特殊的建筑还需要室内或室外某个角度的速写图^{[19]82}，少数需要摄影记录。调研成果内容由组员一起讨论，最后由组长确定使用与否。这种调研方式有赖于调研人员的甄别和图示表现能力。王其明称，由于组内有表现能力杰出的成员，再加上组员们对建筑形式与功能理解有共识，故浙江民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在研究成果上大放异彩^[32]。在一定共识之下，当时的研究方式为编写与调研人员提供了自由的探索空间，他们多元的设计思想也成就了《浙江民居》内容的丰富多样，具体体现在“布扎”体系思想和现代主义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图3）。

2 《浙江民居》中的“布扎”体系思想体现

“构图”（composition）、“要素”（elements）与“构图法则”（primary rules）是“布扎”体系的重要内容。“构图”与“要素”^⑤指建筑设计布局、组合。“构图法则”主要指设计艺术形式方面组合的普遍性原则，如尺度、

比例、韵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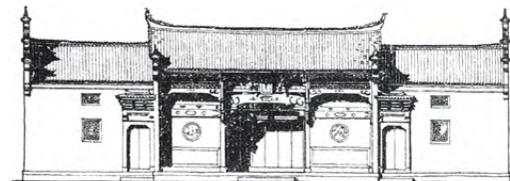
“构图”与“要素”的方法在《浙江民居》中类似体现为“句子”与“词汇”。在尚廓1983年发表的《创造更新更美的江南水乡城镇风貌》中有详细的描述。他将构成建筑造型的局部原件（如门、窗）或由原件组成的部件（如外檐）当做是建筑语言的“词汇”，而把由这些原件、部件组成的建筑单体（如一幢房屋），当做建筑语言的“句子”，词汇按照合理和巧妙的句法结构，通过造句构成句子^[33]。当然，这种看待方式也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尺度变化而变化，如将建筑群体（如一段街景整体面貌）当做“句子”的话，也可将建筑单体及其局部原件、部件作为“词汇”。这种“语言”视角的调研方式，与当时“北京总室”主任梁思成提出的“建筑可译论”的“文法”和“词汇”相似^⑥。该方法是用来解析中国建筑造型要素、结构构件和法式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李华以梁思成与刘致平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为例，证明了这种阐述方式是“布扎”知识结构的体现^[34]。“语言”视角的调研方式在《浙江民居》中体现为对村镇和建筑两种尺度的分析。首先，研究者对水乡村镇进行了内部组成的拆分，将街坊、道路和水道、中心区、商业区、居住区、广场、桥梁及其他建筑要素作为村镇的构成“词汇”，并针对各类“词汇”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归纳（图4）。然后，对民居建筑尺度的地形、建筑内部空间、构造、装饰（外檐壁面、门、窗、檐廊、门窗棂格）和细部等“词汇”进行了分析；各种“词汇”还可进一步划分，如民居内部空间组合方式具有9种平面类型，分解后的基本空间单元具有17种类型^{[8]91-115}。

“构图法则”在《浙江民居》中体现为“句法结构”，并且同样存在不同尺度的差异。村镇面貌的“句法结构”在第二章“村镇的艺术面貌”中有所体现，例如：鳞次栉比、层次错落的房屋，不断变化的街景和河景，丰富的城镇立体轮廓线，大小开合的城市街景空间等^{[8]56-62}。建筑面貌的“句法结构”在第五章“体形面貌”的“几种构图手法的运用”中有所体现，如均衡、韵律、对比、比例^{[8]165-174}（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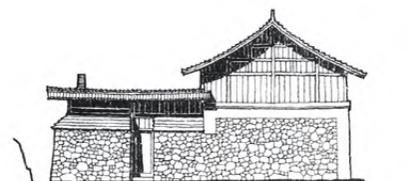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浙江民居》的内容不仅具有“布扎”体系思想的表达，同时“布扎”体系思想也进一步在《浙江民居》中得到了延伸。首先，该书将环境、空间纳入到“要素”构成的范畴，而非仅限于建筑构成要素。其次，“构图”与“要素”应用于不同尺度层面的探讨，大到可延伸至整个村镇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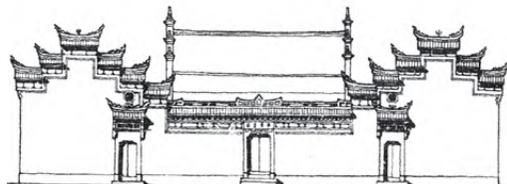
4



东阳白坦乡吴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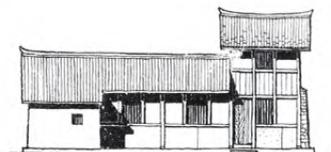


杭州上天竺金宅



5a

东阳十三间头住宅



5b

黄岩临江某宅

4 水乡村镇的桥梁（“词汇”）与沿河建筑群（“句子”）

5 建筑的“句法结构”——均衡

a 对称的均衡 b 不对称的均衡

度的构成解读分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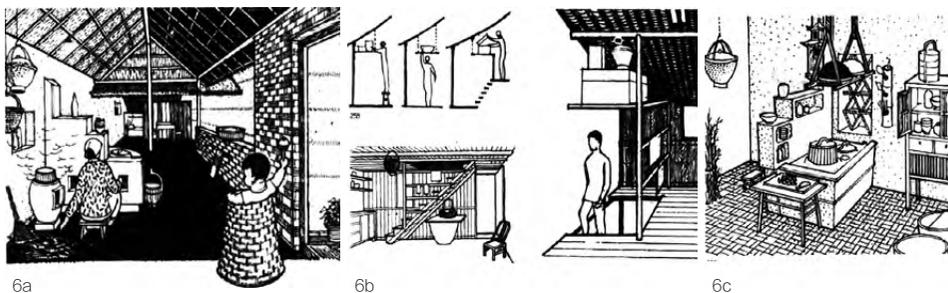
3 《浙江民居》中现代主义思想的融入

编写人员还受到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浙江民居》中具体表现在功能与空间、形式与空间、体形环境等方面。

首先，《浙江民居》关注人（功能）及其生活空间。1962年，民居组在杭州“浙江民居”会议上提交的《浙江民居的室内外空间处理（提纲）》总结道：“从活生生的生活本身出发，来经营居住空间是浙江民居空间处理的根本出发点。这就使这些民居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出发点也是我们向民居学习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35]浙江民居调研的内容及成果展现了对生活的关注，即功能关注。因此，建筑空间有应对浙江湿热气候的需求所产生的空间分隔与联系，也有空间具体的使用方式，并通过室内生活场景的透视图进行表达^{[16]82}（图6）。邵星宇认为，《浙江民居》的研究开创了历

史调研中一个新的建筑观念，书中室内透视图大多以小的场景进行展现，并体现了居民对这一空间的使用方式，有的直接在图上画出相关活动的人物，或以组合图的方式展现人对空间或家具的特殊使用方式^{[1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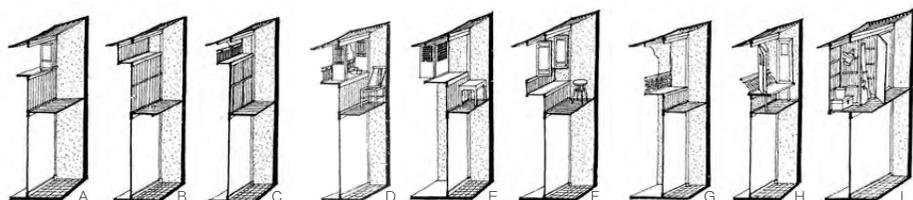
其次，浙江民居的调研也关注到建筑外部形式与室内生活空间的密切关系。建筑形式不再是“布扎”思想的各种要素平面图示化的构图结果，而是根据功能空间组织方式的外部表现。例如书中对民居外檐出挑方式进行归纳，“各种挑法等于在室内加了许多固定家具而不占用地面面积，很适用。同时，从建筑的体形上看，出挑给外观带来很大的影响，使立面有了凹凸及阴影的变化，可见这些手法是很巧妙的”（图7）^{[8]116}。这种由“功能要求引起的体形变化”^{[8]153}的观点在尚廓《民居——新建筑创作的重要借鉴》一文中也有类似的阐述：“民居的艺术表现力并不依靠华丽的装饰、贵重的材料和精美的工艺，而是体现在建筑空间体型本身的艺术造型与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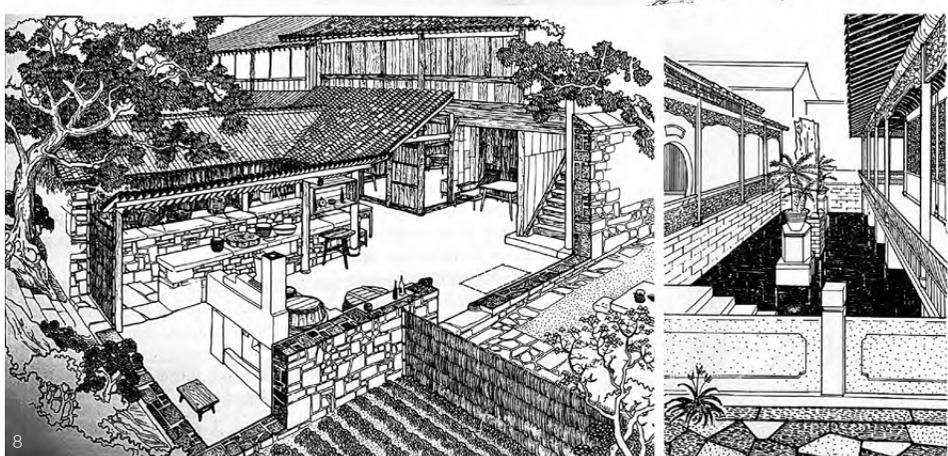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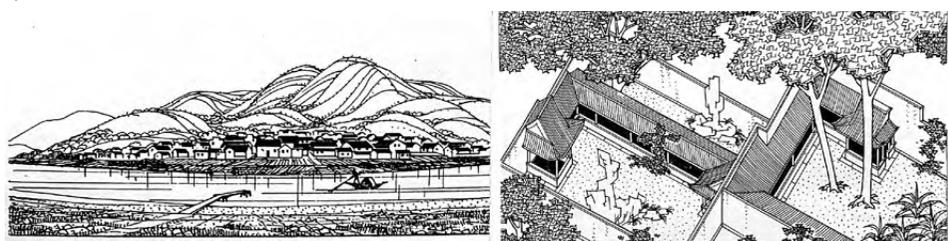
6a

6b

6c



7



8

6 《浙江民居》中的生活空间

- a 小居室生活场景透视
- b 储物架和结合楼梯设置置物与晾晒空间
- c 厨房空间

7 9种外檐出挑方式

8 “体形环境”在《浙江民居》中的体现

能、构造、材料、地形的有机结合上。”^[36]

再则,《浙江民居》对民居建筑的关注不仅在建筑的本身,还有“体形环境”,将建筑之外各个尺度的环境因素纳入调研的范畴内(图8)。不管在民居建筑平面、立面、剖面还是透视图,均展现出了对不同尺度细腻的环境描绘,大到村落布局和构成,小到建筑与基址关系、庭院布局、室内物品摆放等,都体现出当时民居调研对环境的关注。

4 讨论与结论

《浙江民居》将现代主义“空间”“环境”等观念引进建筑史的研究领域,展现了当时民居研究新途径。《浙江民居》从建筑设计角度看待民居建筑,以人的生活为出发点,以空间为载体,将建筑外形视为其内部空间的外在表现,并将建筑置于不同尺度的环境中进行看待;同时将空间放在以往“布扎”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呈现出空间构图的研究思想,从而形成了民居研究中一种新的观和呈现的方式。其背后实质上是多种观念的并存与混杂,这主要与《浙江民居》编写与调研人员以“布扎”体系与现代主义并存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也反映了当时建筑师们的建筑设计思想。

通过对编写与调研人员调研背景、目的及呈现方式的研究,可以明确《浙江民居》内容的丰富性来自于基于“设计”角度两种解读思想的融合——“布扎”和现代主义。“布扎”视角下的《浙江民居》也不再是对平立面的图像组织方式的梳理,而是在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水乡村镇和民居建筑尺度中的“词汇”“句子”与“句法结构”、功能与空间、空间单体与组合类型、空间与形式等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方法。该书民居研究方法所反映的“布扎”和现代主义相互交融的状态,揭示了《浙江民居》的历史价值。

然而,由于当时的编写与调研人员大多年迈或已去世,本研究难以获取更多第一手资料,所以多从《浙江民居》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相互的印证。从学术的严谨性来说,还应将其与民居组在后来进行的“福建民居”成果做对比研究,可惜《福建民居》文稿在“文革”期间被烧毁^{[19]65}。即便如此,该议题的深入仍有待对当时参与人员的相关研究著述、创作和口述资料进行更为全面的多角度互证研究。□

图片来源:图1a引自尚廓《浙江民居》手稿;图1b, 3, 5—8引自文献[8];图1c引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

筑历史研究所,《浙江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图1d引自中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浙江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图2a引自文献[9];图2b引自文献[11];图4引自尚廓《水的建筑文化——中国江南水乡建筑》手稿。

注释

- ① “中国建筑研究室”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最早是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合办时期(1953年4月—1954年12月);第二个时期是(中央)建筑工程部建筑技术研究所(又称建筑科学研究院)与南京工学院合办,直至与“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合并时期(1955年初—1964年12月)。第二个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5年初,南京工学院奉命结束与华东建筑设计公司的合作关系,转与北京刚正式成立不久的“建筑工程部建筑技术研究所”合作续办“中国建筑研究室”,刘敦桢任室主任;第二个阶段是1956年5月,北京“建筑工程部建筑技术研究所”更名为“建筑工程部科学研究院”,刘敦桢仍任室主任;第三个阶段是1958年6月,“中国建筑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并成为建筑工程部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的“南京分室”,其外还有“北京总室”和“重庆分室”。梁思成任“北京总室”主任,刘敦桢任“北京总室”副主任兼“南京分室”主任,辜其一担任“重庆分室”主任。“北京总室”依据工作内容的不同又分为古代建筑组、近现代建筑组、园林组、民居组、装饰组。参见:文献[24],第86—92页;文献[19],第89页。
- ② 参加《浙江民居》原稿的主要编写、调研、测绘及制图的人员有:刘祥祯、王其明、尚廓、傅熹年、陈耀东、何国静、于振生、张勳采、孙大章、丁楚仁等。后一阶段对原稿的增补及加工整理工作由刘祥祯和尚廓完成。此外,原“南京分室”戚德耀、李容淦、付高杰、陆景明,浙江省工业设计院戚高平,原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的程家懿、季雪芳、周培正、张驭寰、赵喜伦等,在前一阶段中也参加了阶段性的调研、测绘工作。参见:文献[8],前言。
- ③ 作为1947—1951年清华大学“营建系”毕业生的王其明称,傅熹年、孙大章等1951年由清华录取的“建五”班的学生仍是拿着“营建系”的学生证。参见:文献[12],第151页。
- ④ 高亦兰作为清华大学营建系1949届的学生,毕业后便留校进行教学工作,她认为:“他(梁先生)起了个名字叫‘体形环境’,就是‘physical environment’,一切有形有体、实实在在的环境,建筑师都应该管,建筑学都应该管,所以这个‘体形环境’一下就扩大到城市、建筑群、建筑物、在建筑内部,一直到装饰到工艺美术。另外,建筑与建筑之间的这个‘landscape’(景观),在他心中也是有形有体的东西。”参见:钱锋,《高亦兰教授谈清华大学早期建筑教育》,《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抢救记忆中的历史(第一辑)》,2018年,第43页。
- ⑤ “构图”是先解决平面功能的需求,再协调三维整体的建筑设计方法,主要通过将整体的组成部分整合、协调起来,用以构筑建筑整体的部分就是“要素”,如墙体、门、拱顶、屋顶等。参见:David Van

Zanten,“Architectural Composition at the École des Beaux-Arts from Charles Percier to Charles Garnier”,*The Architecture of the École des Beaux-arts*,Museum of Modern Art,1977,pp.111-324;John F.Harbeson,*The Stud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gram of the Beaux-Arts Institute of Design*,The Pencil Points Press,1927。

- ⑥ “[中国建筑的]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至如梁、柱、枋、檩、门、窗、墙、瓦、槛、阶、栏杆、隔扇、斗拱、正脊、垂脊、正吻、戗兽、正房、厢房、游廊、庭院、夹道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参见: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徵》,《建筑学报》,1954年第1期,第36—39页。

参考文献

- [1] 龙非了. 穴居杂考[M]//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 第1期. 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4:55-76.
- [2] 刘敦桢. 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M]//刘敦桢. 刘敦桢建筑史论著选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111-130.
- [3] 刘敦桢. 中国住宅概说[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 [4] 刘致平. 四川住宅建筑[M]//刘致平. 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248-366.
- [5] 刘致平. 云南一颗印[M]//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 第1期. 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44:63-94.
- [6] 陆元鼎. 从传统民居建筑形成的规律探索民居研究的方法[J]. 建筑师,2005(3):5-7.
- [7] 李杨文昭,柳肃,肖灿.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居研究与建筑学话语关联研究[J]. 新建筑,2021(1):99-103.
- [8] 中国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 浙江民居[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 [9] 徐美成. 建筑研究院深入调查浙江民居建筑[N]. 光明日报,1962-3-14(1).
- [10]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档案室. 浙江民居[A]. 档案编号0472.
- [11] 刘祥祯. 浙江民居建筑艺术[N]. 人民日报,1962-5-13(6).
- [12] 杨永生,王莉慧. 建筑史解码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 [13] 王天锡. 香山饭店设计对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讨[J]. 建筑学报,1981(6):13-18.
- [14] 张永和. 传承与重构|张永和教授在“中国建造”(展览)开幕式的主题报告[E/B/OL]. (2022-01-28)[2022-03-24]. <https://new.qq.com/rain/a/20220328A08LHJ00>.
- [15] 汪之力. 浙江民居采风[J]. 建筑学报,1962(7):

10-18.

- [16] 赵越. 走向民间建筑,探索另一种传统:对中国建筑研究室[1953-1965]之住宅研究的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2014.
- [17] 邵星宇. 从“依图组合”到“案图造型”:从“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看中国建筑设计观念演变(1930s-1950s)[D]. 南京:东南大学,2017.
- [18] 李宏图. 作者、文本与历史性阐释:基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理解[J]. 历史研究,2018(1):20-28.
- [19] 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中国建筑研究室口述史(1953-1965)[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 [20] 沈攀,林广思. 尚廓风景建筑创作思想的发展研究[J]. 建筑师,2021(5):67-74.
- [21]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时代建筑》杂志编辑部. 悠远的回声:汉口路151号[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 [22] 袁镜身. 回顾三十年建筑思想发展的里程[J]. 建筑学报,1984(6):63-68.
- [23] 曾坚,罗湘蓉. 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守故迈向创新:中国建筑理论探索60年的脉络梳理[J]. 建筑学报,2009(10):5-9.
- [24] 姜海纳. “中国建筑研究室”初创及研究成果探究[J]. 建筑师,2013(3):86-92.
- [25] 陈薇. “中国建筑研究室”(1953—1965)住宅研究的历史意义和影响[J]. 建筑学报,2015(4):30-34.
- [26] 王其明. 话说名居研究[M]//杨永生. 建筑百家言.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108.
- [27] 钱锋,伍江. 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20—1980)[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28] 王其明. 忆梁思成先生教学事例数则[J]. 古建园林技术,2001(3):19-21.
- [29] 傅熹年. 记北京的一个花园[J]. 文物参考资料,1957(6):13-19.
- [30] 林广思. 造园组创办始末[J]. 中国园林,2022,38(6):40-44.
- [31] 傅熹年. 一代宗师垂范后学:学习梁思成先生文集的体会[M]//高亦兰. 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12-14.
- [32] 王其明. 梁思成成为我的论文答辩当翻译[M]//杨永生. 建筑百家回忆录.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110.
- [33] 尚廓. 创造更新更美的江南水乡城镇风貌[J]. 建筑学报,1983(12):27-36.
- [34] 李华,邵星宇. 从“依图组合”到“案图造型”:从《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看一种中国建筑设计观念[J]. 建筑学报,2016(11):1-9.
- [35] 尚廓. 浙江民居的室内外空间处理(提纲)[R]. 南京:东南大学,1962.
- [36] 尚廓. 民居:新建筑创作的重要借鉴[C]//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 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92-109.

收稿日期 2022-09-23

编辑:朱晨、黄彬